

周一平文集

日版 《毛泽东集》
《毛泽东集补卷》
校勘与研究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n Mao
Zedong Set and Mao Zedong Set
Supplementary Volume
By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周一平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周一平文集

日版《毛泽东集》
《毛泽东集补卷》
校勘与研究

周一平 著

周一平文集：

日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与研究

著 者 / 周一平

文稿审阅 / 文 静 晓 竺

责任编辑 / 余志成

特邀编辑 / 华 成

封面设计 / 周 隽

编辑校阅 / 第六编辑室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华侨商业中心 15C

电 话 / 00852-67270657

传 真 / 00852-30785638

网 址 / <http://www.bookhk.com>

电 邮 / 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9.5

字 数 / 258 千字

印 数 / 1000 册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988-16760-5-4

定 价 / 76.00 元

读者购书及查询,可直接登陆网站 <http://www.bookh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扬州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一平基金资助出版

《一平文库》总序

本文库收入有原创性的社会科学著作及博士论文，以宏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本文库将由学术界的小不点生长为勇敢威武的战士。

本文库将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收入本文库的著作及博士论文，都得到一平基金的一些资助。

《一平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9年新春



竹内実、周一平在竹内实家门口(日本京都,2003年3月23日)



竹内实、周一平在竹内实家(日本京都,2003年3月23日)



村田忠禧、周一平在村田忠禧家(日本川崎,2003年4月2日)

目 录

竹内实:小序	1
村田忠禧:毛泽东著作研究的历程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代序)	6
凡例	25
一、中国大量整理出版毛泽东的文稿后,日本版《毛泽东集》、 《毛泽东集补卷》有必要进行补充、修订	27
1、中国版毛泽东集子中有不少文稿是日本版毛泽东 集子中所没有收入的	29
2、中国版毛泽东集子中有很多文稿是从档案、作者 手稿中抄录的,大多能保持文稿完整,而日本版 毛泽东集子有的文稿不完整	30
3、中国版毛泽东集子中有很多文稿是从档案、作者 手稿中抄录的,大多能保持文字准确,而日本版 毛泽东集子的文字有讹误	42
4、有些毛泽东的文稿,中国版毛泽东集子与日本版 毛泽东集子,同样是辑录自报刊等,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版毛泽东集子的文字往往准确些,完整些	54
5、中国 1991 年版《毛泽东选集》修订本,对 1951-1960 年 版的初版本在正文等方面都作了修订	62
6、1982 年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作了不少修订	69
二、日本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在编纂中已 经存在的缺陷	72
1、《毛泽东集》与《毛泽东集补卷》存在一些重复	72
2、有些不是毛泽东的文稿也收入了	78
3、有抄录、校勘疏忽之处	81

4、某些文稿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判断还有失误	90
5、标点有缺陷	96
6、编纂方面还有一些小失误	99
7、“不收录现行《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 中收录过的著作”的编辑方针不够妥当	100
8、搜集了大量资料,仍可进一步下功夫	101
三、日本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至今仍存在的价值	125
1、日本版毛泽东集子中至今仍有一部分文稿是中国 已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集子中还没有收入的	125
2、日本版毛泽东集子中收入的一部分文稿是全文,中国版 毛泽东集子中收入的不是全文,有些文稿的内容,日本 版毛泽东集子中多些,中国版毛泽东集子中少些	127
3、努力保持毛泽东文稿的原来面貌,不作删节、修改	129
4、日本版毛泽东集子中保留了毛泽东文稿中的图表	150
5、日本版毛泽东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稿有校勘记	151
6、日本版毛泽东集子有不少精到之处	174
7、对一些没有署名的文稿进行了研究、推测	180
四、《毛泽东著作年表》校勘记	194
1、对《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作了修订补充	194
2、至今仍存在的价值	197
3、存在的问题	207
附录:《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校勘记	220
一、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	220
二、忽视国内的资料、研究成果	227
三、其他问题	259
后记	292

小 序

前些天,周一平先生专程枉驾到我的小屋来了。先生特意带来一本高著《中共党史文献学》二〇〇二年九月刊,和一份打印本《〈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略记》惠赐。

《毛泽东集》是我监修的,一共是十卷,一九七〇年由北望社开始出版,一九七二年结束出版。后来由苍苍社接续,一九八三年出了修订版即第二版。苍苍社又出了《毛泽东集补卷》一共是十卷,其中包括别卷《毛泽东著作年表》。一九八六年结束出版。

周先生的《校勘略记》是今年,即二〇〇三年三月写成的。真没想到《毛泽东集》开始出版以来已经有了三十三年,有位周一平先生写出《校勘略记》。

周先生是由村田忠禧先生好意领路而来的。从东京到京都利用新干线,一般是花三个钟头就可以到(仔细说:还少十分钟)。那天到了预定时间,还没到。我给村田先生家打了电话问问,真的起身了没有?之后不用五分钟,他们就出现在我家门口了。

我们在狭隘的客厅里坐下来之后,周先生交了我名片,提醒我,我们并不是初次见面。据先生说:七、八年以前,我访问过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周先生在座谈会上。我想可能是一九九六年九月初。

这样我们就谈起来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之间,我们很投机,愉快,舒畅。现在回忆起来真有文人清谈的味道。究竟谈些什么呢?我却忘掉了。不过,当时我心里想:头天,京都天气并不怎么好。又下雨,又刮风。今天正是好天气,樱花也将要开,反而我心里有点难受;这么好天气,他们就闷坐在我这间小房间,真对不起。

谈话将要结束时,周先生要我写《校勘略记》的序。我欣然答应。

临走之前,我告诉他们可以上楼上去看看我的书桌、书架子,可以

了解日本的退休的大学教授生活情况。他们上了楼了，我并没有陪他们。楼上有两间屋子，还有一间小小的小房间。

告别时，我们在门口拍了两张照像。

那天晚上他们在京都住，第二天观光，就回东京。在京都车站上给我打电话告别。

昨天，村田先生来了信，里面是那天拍的照像和周先生的信。周先生催促要我早日写序文。我就执笔开始写此文。执笔之前，我先拜读《中共党史文献学》。逐页的读，肃然起敬。周先生在这本书中，从严密的考证“文献”这个词的定义开始，一步一步展开对文献学的概念的分析 and 它的内涵的论述。这是一部严格谨慎的学术著作。

人家都知道：清代的学问是所谓“乾嘉之学”，是以考证为特色的。成绩也出色。是中国的传统学问的主流。周先生基于这主流，构成党史学。

先生的高著，并不是死板的。它不仅整理过去的学术概念，还提出肯定这主流思想的主张（当然学术上的主张。这里说“肯定”是对周先生的看法而已），而且还包括基本知识。我明白了它的资料性，就马上找发电报时用的代号。找的是三十一日的代号。果然找到了“世”和“引”（333页）。

日本一般的字典找不到《韵目代日表》。现在日本大学里，学中文即现代汉语的学生不少。但学生缺乏这门知识。如果学生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课，老师当然讲授二百零六韵。但不会也没有必要提到以韵目代日此事。不但大学生没有这门知识，甚至老师也没有。多年以前，某位大学教授，翻译“艳电”，弄出笑话来。“艳电”，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名，是汪精卫，抗战时离开了陪都重庆之后，在河内发表通电，他要走“和平建国”的路。这位教授，不知道“艳”字只表示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着“艳”字望文生义，写了教授自己的解释。现在日本学生利用的辞典（所谓《中日辞典》）都没有收《韵目代日表》。

我在两个月以前，读了周而复先生写的《逆流与暗流》（《长城万里图》第三部），其中有“艳电”（205页）。我的思考，就联想到那位大学教

授曾经的误解,又引起好奇心,找了《韵目代日表》,没有。不但日本出版的辞典里没有,甚至中国出版的《辞海》也没有。只有一本东京文求堂出版的《汉字典》有。它一九四〇年出版,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非常流行的《学生字典》翻成日文的本子。确认了二十九日,我顺便看下去,就发现那张表格没有三十一的代日。古韵上平、下平声 15 韵,上声 29 韵,去声 30 韵,入声 17 韵。那么三十一日以什么代呢?我心里纳闷。昨天晚上,从周先生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

这里姑且不提周先生书里面对“文献”这个词儿所下的严格定义,我个人的理解上,完全赞成周先生这种把“文献”放在“党史”这门学术专题上,也可以说这门学问的基础上的学术态度。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了,那天我跟周先生、村田先生见面谈话时,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谈的。我是这样讲的:

我是京都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回到东京,慢慢地走上研究现代中国的路子上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的学术立场是什么?我想起母校京都大学是以京都学派的名称而有名。对它的定义各色各样,但我个人认为:以文献的解读为主流,让文献自己讲话。当时我觉得东京的学者喜欢自己讲话,对文献里面的真实不太重视。

所以我觉得对毛泽东也应该重视原来面貌。幸好东京有一家图书馆:东洋文库。有一九二〇年、三〇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刊物的胶片,虽然不全。当时,我是东京都立大学(不是东京大学)副教授,而日本大学生受到“文革”冲击,不愿意上课。那么还可以到东洋文库里找毛泽东、中共的材料,也不是好事?

研究室有两位助教,即:藤本幸三、市川宏两位君子,我商量他们,他们同意组织学生,成立了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以这个团体为主体,搜集、整理材料。我看他们的稿子,我还判断,哪些稿子该不该收,这样当监修。

幸亏有一家出版社,叫北望社,社长是都立大学的毕业生和田武司先生,他同意出版。也亲自参加整理、校对工作。开始时,我打算出日译本毛泽东集,但学生说:很难翻。我就改变了主意,出中文版。这反而带

来好处,中文是有国际性的,海外读者的预约订购,远超过我们估计。出版结束之后,北望社给我一笔监修报酬。给了多少,我已经忘记了。发给学生多少、出版社盈利多少,我一概没有过问。

也许读者觉得奇怪:这篇小序,不像序文,提到题外的话,啰嗦啰嗦。总之,我是这样对周先生介绍出版《毛泽东集》的内幕。

因为我觉得我的对文献的思考,跟周先生一样,或者差不多一样。但它的前提条件,读者不难看出,完全不同。从事这个集子的人,都是自愿的,从事以后也并不是拿到薪水的(可能拿到报酬,但我估计不会多),也可以说我们背后没有什么势力、党派、团体。这样的话虽然不必提,但趁这个机会讲清楚吧!我讲这些话并不是针对周先生讲的。希望周先生和中国读者谅解。因为在当时,在日本有的人散布谣言:他们(即我们)是拿了美帝国主义钱。现在我在这里要回敬的。

现在应该提到《校勘略记》了。

呵!我真没想到会有人这么认真的检点我和我们的工作!周先生不仅是对《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仔细检阅,而《补卷》里的《别卷:毛泽东著作年表》也仔细检点,提出错处、不足。周先生是毫不客气的表示自己的看法。这是很难得的。周先生把我们《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出版以后,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文稿的集子十八种列举之后,下了断语,“这些(在中国出版的)集子的出版,使日本版的毛泽东集子不能再戴‘内容最全面’‘最为精致’的桂冠”(4页)。我完全承认这句断语。周先生的断语并不是武断。下面列举了我们的集子没有收入的,虽然收入了但不完整的、文字有讹误的,比较起来中国版本准确的等等很多例子。还指出:一九九一年版《毛选》修订本已经修订的,我们的集子没有修订的地方。虽然我们出版时,一九九一年版《毛选》还没出,但这种指摘举例对学界还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周先生还指出编纂中的缺陷。这主要是应该由我负责。有的重复,有的不是毛泽东的文稿,有的不是毛泽东审定的,有的编者疏忽的,有的日期等判断失误的,有的标点缺陷的,有的编纂上失误、方针不妥当的,还有搜集材料上还可以进一步的(但,周先生肯定我们下的功夫不

少)。就着上面,周先生一一举出实例来,我真敬佩周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而后面来了,日本版集子仍存在的价值。这些读者可以读本文明白,不必在这里举出。我只在这里表示感谢,周先生周到、公平的态度。而有的段落读者可以当作一种读物来读。它们很有兴趣。

我还敬佩周先生对《毛泽东著作年表》(《补卷》别卷)也没有轻易放过,而认真对待,肯定的下了断语:“(它)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仍是当时最主要的毛泽东著作编年著作,甚至至今仍有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编年著作尚未达到的水平。”虽然我认为这是过奖了,但《著作年表》是中村公省先生编的,《毛泽东集》出版,《毛泽东补卷》的编纂也是主要依靠中村先生的孤军奋斗才能出版的。所以我还是领受周先生的学术评价吧!

啊!我还要重复讲一遍前面已经讲的话,我、我们开始这种工作已经有了三十三年,好容易有了,也可以说碰到了周先生这位谨慎的学者,来给我和我们批判缺陷。我很高兴。这才是学术交流。我已经有了中国学界的前辈的鼓励,我真觉得我从事的研究是对的。现在又受到周先生这样很有前途的、已经有卓越的成绩的学者来青睐,很感激。

我要表示和记录现在我感到的感激,因此才写出这篇小序。

竹内实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二日于京都白川畔空竹居

(原文为中文)

毛泽东著作研究的历程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代序)

村田忠禧(日本横滨国立大学)

引子

华东师范大学的周一平教授于2003年3月作为横滨国立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外国客员研究员访日时,携带着他刚刚写好的论文《〈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略记》,来征求曾参与《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编辑工作的我们日本研究者的意见。他着手这篇论文的直接起因于我。去年9月,我去华东师范大学讲课时,向他赠送了《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因为《毛泽东集补卷》在苍苍社还有库存,所以买到了。但是,《毛泽东集》第二版已经没有库存,而在旧书店也没能找到。在一家旧书店里仅存的一套《毛泽东集》第二版已被我买去赠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郭德宏教授了。得知还有70年代出版的北望社版《毛泽东集》,于是我就只得将北望社版赠予了周一平教授。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他会进行《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的校勘工作。如知道此情的话,我当时就会告知他,《毛泽东集》有第二版,应将第二版作为校勘对象。而当我得知他并不知道有第二版存在这个事实,正在使用旧版《毛泽东集》进行校勘时,已是他的校勘工作进展到相当程度了,心中不免有些歉意。后来他到我家,就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某些异同作了校勘,总算减少了一些遗憾。

一、《毛泽东集补卷》编辑的回忆

我并未参加包括第二版在内的《毛泽东集》的编辑。至于《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辑,我也并非从启动时就参加的。看到苍苍社打出的《毛泽东集补卷》出版预告,我知道我自己收集到的许多毛泽东文献,在即将出

版的书中没有涉及。因为当时我正在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研究过程中从江西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各地出版社出版的资料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想，既然准备出版《毛泽东集补卷》，我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应该积极地参加、配合出版工作。这样，我就去拜访苍苍社，见到中村公省社长，把我收集到的资料一览表拿给他过目，表达了自己愿意提供资料的意思。那时，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提供我拥有的资料，作为等价交换，能否将当时刚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集》第二版和此后出版的《毛泽东集补卷》各提供给我一套。当时我还在读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极其渴望得到一套《毛泽东集》第二版，但是，68000日元这个价格却使我可望而不可及。中村先生的回答是：《毛泽东集》第二版可以打八折提供，提供一套此后出版的《毛泽东集补卷》。在我得知他的出版社是一个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一名打工的社员的小小出版社时，我也只能答应了他的条件。

后来，我不仅提供了以前自己收集的资料，还开始着手搜寻尚未发现的资料。中村先生也将他收集到的工具书、资料集积极地提供给我，于是我的调查对象就愈发广泛，因而有了一些新发现。中村先生在一篇《对毛泽东的本名·化名·笔名的考察记》的文章开头部分如此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涉猎《毛泽东集补卷》的原文之际，深受恩惠之一的便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杂志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村田忠禧翻阅这本书中的《前锋》杂志目录时，发现了“石山”名义的《省宪政下之湖南》（一九二三·七·一）一文，于是他气喘吁吁地奔跑回苍苍社来时的景象，使我难以忘怀”。（《历史中的毛泽东——其遗产与再生》第二版，苍苍社1986年12月，第121页）

中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介绍了我和施拉姆围绕是否收入文献《基础战术》，在日本国际文化会馆展开“交锋”的情况。在这次“交锋”之后施拉姆去了北京，向当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请教，得到的回答是，《基础战术》并非毛泽东的著作，从而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

确的。龚育之对施拉姆还谈到了许多其他的重要的内容,这些在龚育之著《在历史的转折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3月)均有记载。我将之翻译成日文,登载于前文中提到的《历史中的毛泽东》。

不是实际经历过的人或许不清楚,收集资料真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宛如沙里淘金。自以为发现了新资料而欢天喜地地拿到苍苍社去,实际上那资料已有收录。这种情况还算好,几乎都只不过是作了一番旧有结果的再确认。至于缩微胶卷中的手写资料,原本拍摄状态就不好,字迹不清晰,难以辨认,尚有错字、漏字。长时间盯着显微阅读器昏暗的屏幕,眼睛会极度疲累。煞费苦力才能辨认出来,将之文字化,就我本人来说是竭尽全力了,然而,后来再读中国出版的论文,判明由我文字化的文章中有部分的差错,使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虽然为了收集毛泽东的资料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然而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过程。在此,我衷心感谢苍苍社的中村公省先生对我的多方关照。

二、《毛泽东集补卷》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关系

如此奋斗得到了回报,《毛泽东集补卷》由最初预定刊印的文稿5卷、著作年表1卷的6卷本最终增加到文稿9卷、著作年表1卷的10卷本。为了纪念《毛泽东集补卷》刊印工作的完成,苍苍社于1986年3月23日召开了研讨会。当天,时值春季,东京却稀奇地下起了雪,交通因之混乱。但是《毛泽东集补卷》监修人竹内实教授从京都、施拉姆教授远道从美国赶来,分别就毛泽东作了报告。我也在会上以“从数字看《毛泽东集补卷》的特征”为题作报告,指出了以下的问题:

“即,大致可以指出:《毛泽东集补卷》的资料来源,随着近年来在中国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报纸、杂志或党内文献等档案的公开,正在以影印版的出版或资料集的编纂的形式迅速地展开。但是,只是公开各种资料,要想找出毛泽东的文稿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署他的名字的文稿数量极少。要想确定即使没有他本人名字的署名的文稿为毛泽东的文稿,那么就需要为之证明‘证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年来在中国进行的党史研究的发展和回忆录的出版对毛泽东文稿的收集起了重要的作